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628

19 世纪中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征服和统治突厥斯坦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

陶克清¹

(¹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要: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 俄罗斯帝国在征服与统治突厥斯坦地区期间,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伊斯兰教的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帝国在殖民扩张过程中, 对伊斯兰教这一重要社会文化力量的复杂态度和应对策略。从最初的尊重与非干预, 到中期的俄化政策推行以及对新兴意识形态的应对, 再到后期更为深度的政策调整, 这一系列演变不仅反映了俄罗斯帝国在整合中亚地区过程中遭遇的诸多挑战与困境, 也为当代世界处理多元文化共存、宗教与政治关系等全球性议题, 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考。

关键词: 俄罗斯帝国 突厥斯坦 伊斯兰教 宗教政策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 俄罗斯帝国在对突厥斯坦^②地区 (Туркестан) 进行征服与统治的过程中, 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复杂性与多变性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构成了俄罗斯帝国殖民扩张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对中亚地区当时及后世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一、征服中亚过程中俄罗斯的伊斯兰教政策转变

18 世纪中叶, 俄罗斯帝国在完成了对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探险和军事占领后, 开始将目光投向中亚地区。在中亚北部, 俄罗斯帝国先后设立了喀山总督区^③ (Каз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阿斯特拉罕总督区^④ (Астрах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乌法省^⑤ (Уфим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和托博尔省^⑥ (Тоболь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等边疆省份, 并沿着这些省份的南部边界线和额尔齐斯河不断修筑军事堡垒, 形成了一条直面中亚哈萨克人和准噶尔人的“奥伦堡堡垒线”, 通过“切香肠”的方式逐步蚕食中亚土地。

早期作为征服者的俄国殖民者深受大俄罗斯主义和东正教为正宗观念的影响, 并怀有一定的宗教复仇心理。俄罗斯人有着 13-15 世纪被蒙古人征服、统治并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历史, 当初罗斯人各部正是利用宗教热忱摆脱蒙古人的统治而取得独立, 他们对蒙古人的战争往往被赋予拯救东正教徒免受伊斯兰教徒迫害的意义。这种历史背景使得俄罗斯人在内心深处对伊斯兰教产生蔑视和仇恨, 并将强迫穆斯林改信东正教视为己任。

在 16 世纪后期至 18 世纪前期, 俄罗斯帝国对穆斯林采取了迫害歧视和强迫改宗的政策。1552 年兼并喀山汗国、1556 年吞并阿斯特拉罕汗国后, 俄罗斯帝国境内拥有了大量穆斯林人群。这些穆斯林在社会地位上无法与基督教徒平等, 未受洗的人 (首先是穆斯林) 无权雇佣或支配东正教徒, 俄罗斯帝国甚至下令

^① [作者简介]

[1] 陶克清 (1990—), 男, 安徽马鞍山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② 这里的突厥斯坦地区指的是中亚南部俄属突厥斯坦 (Рус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即俄罗斯史学界狭义上的中亚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

^③ 建立于 1708 年。

^④ 建立于 1717 年。

^⑤ 建立于 1719 年。

^⑥ 建立于 1719 年。

对那些“走上歧路”信奉伊斯兰教或其它非基督教的人进行最严厉的惩罚^{[1]168}。穆斯林神职人员被剥夺权利，瓦克夫^⑦土地被强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被破坏或关闭。对于不信东正教的鞑靼贵族，根据俄罗斯帝国政府的特别法令，他们的土地和农奴被剥夺。此外，俄罗斯帝国还在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巴什基尔人居住的地区强制推行东正教，甚至出现将整村的人赶下河去集体受洗的情况。这些宗教暴政引发了穆斯林的激烈反抗。

然而，到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帝国政府吸取了喀山^⑧等地的教训，开始认识到仅凭强迫和武力无法使境内穆斯林民族改变信仰，于是转变策略，改而利用伊斯兰教为其殖民扩张服务。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结束了宗教迫害政策^{[1]170}，在奥伦堡建立了供给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穆斯林使用的宗教集会场所，幸存下来的鞑靼贵族得到了与俄罗斯贵族同等的权利。为了削弱布哈拉毛拉们在哈萨克草原的影响，俄罗斯帝国选用控制区内与沙皇政府合作的鞑靼毛拉，雇佣他们到草原传教，试图通过这些与沙皇政府合作的伊斯兰神职人员来控制中亚地区的宗教信仰，借以掌握中亚人的宗教领导权^{[1]170}。然而，这些鞑靼神职人员很少能真心与俄国人“合作”，反而在中亚地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想，刺激了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

二、考夫曼的“不干涉主义”政策

1867年，随着突厥斯坦总督府在塔什干的正式设立，俄罗斯帝国对突厥斯坦地区的统治进入了更为系统与深入的阶段，相应的宗教政策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与完善。为了降低军事征服的阻力并为后续的行政管理创造相对稳定的环境，俄罗斯统治当局采取了一种表面上较为温和且具有一定试探性的宗教政策。

突厥斯坦总督区（1886年后改为突厥斯坦边区）成立初期的宗教政策核心原则是：一、保持对宗教与风俗的表面尊重。俄罗斯帝国当局公开宣称尊重伊斯兰教以及当地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传统，避免因直接冲击当地宗教文化而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情绪。二、宗教事务的非干预主义。当局明确表示不主动介入当地的宗教活动与宗教事务，允许清真寺等宗教场所正常开展宗教仪式与活动，维持当地宗教的自主性。三、传统管理机构的利用。在构建地方行政管理体系时，俄罗斯帝国充分利用当地已有的传统管理机构，而这些机构往往与伊斯兰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与当地的宗教领袖、部落首领等合作，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管控。

首任总督考夫曼认为对伊斯兰教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进攻，而是当没有穆斯林一样^{[2]117}，这样也就没有伊斯兰教问题了，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得益于此，伊斯兰教社会宗教体系的三大支柱得以保留：穆斯林初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确保了宗教知识的传承；清真寺和圣地，保障了宗教仪式的自由进行；沙里亚法庭，维护穆斯林的生活规范^[3]。然而尽管表面上采取了不干涉的宗教政策，但俄罗斯帝国当局并非完全放任当地宗教势力的发展，考夫曼废除了一些宗教职位并竭力阻止鞑靼人来突厥斯坦边区传教^{[1]202-203}，以排除他们对当地人的宗教影响，在土地分配、税收制度等关键领域，也悄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政策调整，为后续深入控制该地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埋下了伏笔。

考夫曼主导的土地改革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相互交织的关键案例。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土地使用方式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然而在推进过程中引发了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争论。考夫曼主张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以公社或家庭为单位进行分配使用^{[4]228}，这一举措会收回包括大量归属于清真寺或宗教学校的瓦克夫土地；而自由派则积极推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土改模式，外交部更是担心此举会激怒中亚地区的大地主和宗教界人士，引发强烈的政治危机^{[4]254}。尽管存在分歧，改革初期仍按照考夫曼的设想进行，直至1886年《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的出台，才使土地政策在法律层面得以进一步明确与规范。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帝国试图在突厥斯坦地区全面推行俄化政策，教育领域也成为宗教政策的核心阵地。当局大力兴办俄式学校，旨在培养一批具有俄罗斯文化认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以此来削弱伊斯兰教在当地社会中的思想影响力，并逐步传播俄罗斯的价值观与文化体系，实现对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深度改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中亚地区的兴起，给俄罗斯帝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这些思潮主张团结所有突厥民族或穆斯林群体，以抵抗外来殖民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泛突厥主义者在教育领域掀起了“扎吉德运动”，他们以启蒙为中心展开活动，要求伊斯兰教改革，进行教育改革，建立新方法学校^[3]，其中部分激进分子受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主张中亚脱离俄罗斯，

^⑦ 瓦克夫（Bakıf/Waqf），特指伊斯兰教的宗教用地或财产，通常由捐赠者将其土地或财产捐赠给清真寺、宗教学校等宗教机构，其收益主要用于支持宗教活动、教育、慈善等公益事业。

^⑧ 1731年喀山东正教大主教卢卡·科纳舍维奇发起大规模的改宗运动，随后发生了屠杀鞑靼人的流血事件。

建立独立的大突厥国家^{[2][120]}。俄罗斯统治当局虽然对这些思想的传播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其应对策略往往相对滞后,并不能有效遏制这些思想影响力的增长。

三、杜霍夫斯基的宗教政策调整

俄罗斯帝国统治之初,考夫曼的“不干涉主义”起到了很好的缓和宗教矛盾的作用,然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亚地区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抗议、示威活动频繁发生,甚至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起义^⑨。在这些社会动荡事件中,诸如“泛伊斯兰主义”等宗教因素往往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与凝聚作用,使得俄罗斯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宗教政策。尽管长期以来俄罗斯帝国当局试图维持“不干涉政策”的表象,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中央与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伊斯兰教在中亚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以及其在民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对宗教政策进行深度反思与调整。

1899年,突厥斯坦总督杜霍夫斯基向俄罗斯皇帝提交了《突厥斯坦的伊斯兰教》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宗教政策原则,包括使当地神职人员摆脱国内外伊斯兰教中心的控制与影响、削弱苏菲主义在突厥斯坦穆斯林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防止瓦克夫资金被用于反政府宣传活动、在穆斯林学校课程中引入欧洲元素等,这些成为他在突厥斯坦开展宗教政策改革的指导思想。

杜霍夫斯基认为“冲淡伊斯兰教徒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5],在考夫曼的伊斯兰教政策上他作了大幅调整,他限制伊斯兰教宗教机构的发展,严格控制穆斯林经学院和初级学校,拒绝给中亚穆斯林设立宗教管理机构,并把它们和伏尔加流域的穆斯林的联系割断,排除来自喀山、巴什基尔地区的影响。对宗教上层人士的选举也加以审批和管控,防止鞑靼人把持中亚地区的宗教权力^{[6][198]}。削弱伊斯兰教法权威,限制沙里亚法在当地的适用范围。在经济上剥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对瓦克夫土地收税,还限制每个乡只能供养一名专职的教士^{[7][78]}。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试图培养俄方懂中亚语言和情况的军事和行政干部,同时把俄国语言和文化介绍给当地人,至少给小部分中坚分子,以改善双方公众的关系,促使这部分中坚分子以后带领全体居民脱离他们的宗教首领,并使之倾向俄国所代表的现代世界。

然而,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一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俄罗斯统治当局也未能有效缓解当地的宗教紧张局势,反而因为降低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地位遭到强烈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

四、俄罗斯突厥斯坦宗教政策的困境与思考

尽管俄罗斯帝国在突厥斯坦地区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政策调整,试图在尊重伊斯兰教传统与实现殖民统治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但最终这些政策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反而陷入了诸多困境。

首先这要归结于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性,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管理机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与脱节现象。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地方层面往往因官员的更替、地方利益的考量以及对当地实际情况的不了解等因素而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导致政策执行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受到严重破坏。

其次,俄罗斯统治当局对伊斯兰教影响力存在系统性的忽视。俄罗斯帝国当局在制定与实施宗教政策时,未能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民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许多政策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未能深入触及当地居民的核心关切与宗教情感,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

俄罗斯当局社会经济政策的缺陷与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土地分配、税收制度等关键社会经济领域,俄罗斯帝国的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历史权益与现实需求,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与抵抗情绪。这些社会经济问题与宗教因素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社会的不稳定。

俄罗斯帝国统治突厥斯坦地区期间这些宗教政策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不仅对于理解当时中亚地区的社会变迁、文化冲突以及政治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世界在处理多元文化共存、宗教与政治关系等全球性议题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的参考与借鉴,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宗教因素在地区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中的复杂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 [1] 孟楠.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
- [2] 蓝琪.中亚史六卷本(第6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⑨ 比如1892年塔什干“霍乱”起义和1898年安集延起义。

- [3] Лысенко Юл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механизм закрепления имперских позиций России в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м крае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начало XX В.)[J].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4): 194-198.
- [4] Кауфман К.П.. Проект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его отчета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а фон Кауфмана 1-го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управлению и устройству в областях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а [M]. СПб., 1885.
- [5] 孟楠.沙俄征服中亚后对伊斯兰教的政策[J].西北史地, 1998(2): 45.
- [6] Gavin Hambly, et al.. Central Asia[M].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69.
- [7] 陈联璧, 刘庚岑, 吴宏伟.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Russian Empire's Islamic Policies during Conquest and Rule of Turkestan from Mid-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ao Keqing¹

¹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ies, during the conquest and rule of Turkestan, the Russian Empire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Islamic management policies. These reflected its complex attitude and strategies towards Islam, a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force, during colonial expansion. From initial respect and non-intervention, through mid-period Russification and responses to emerging ideologies, to later deeper adjustments, these policy changes showed the challenges the Russian Empire faced in integrating Central Asia, and offer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today's world in dealing with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religion-politics relations, etc.

Keywords: Russian Empire, Turkestan, Islam, Religious Policy